

教育研究集刊  
第七十輯第一期 2024年3月 頁163-175

# 書評：評介《轉型正義與教育： 讓年輕人參與和平建設與和解》

## *Review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Engaging Young People in Peacebuilding and Reconciliation*



葉珍玲

### 壹、前言

Clara Ramire-Barat與Martina Shulze（2018）之《轉型正義與教育：讓年輕人參與和平建設與和解》（*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Engaging Young People in Peacebuilding and Reconciliation*）（以下簡稱本書）是2015年6月在德國Braunschweig舉辦的「促進永續和平的教育」國際夏令營的成果，此為期一週的夏令營係由Georg Eckert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和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所共同主辦。來自非洲、亞洲、歐洲和北美等多國的青年學者、資深學者以及實踐者參與了此次活動。與會者

聚焦討論轉型正義與教育的關聯，探討的核心問題有四，包括：衝突敏感課程（*conflict-sensitive curricula*）和課程改革、教育媒體（*educational media*）和教材、轉型正義過程中的教育活動，以及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協調。上述研討重點凸顯了教育、轉型正義與和平建設之間的密切關係，並強調了周延的課程設計、教材和利害關係人參與的重要性。

本書的價值和重要性展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它凸顯教育、衝突和轉型正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深入探討了教育在後衝突社會中的雙重作用：既可能加劇分歧，也可以成為促進和解的工具。其次，它探討如何在教育領域應用轉型正義框架（*transitional justice framework*），以解決過去衝突和壓迫造成的教育缺陷，並引導教育部門的重建。第三，它強調教育和轉型正義之間的協同作用，提供了實踐方法和策略，有助於推動後衝突社會的教育轉型與和平建設。最後，它勾勒出變革機會和現實期望，指出在教育和轉型正義交集處辨識變革機會的重要性，同時保持對可實現成果的現實期望。換言之，本書提供一個平衡的觀點，闡述了在這一個域中所面臨的挑戰和限制，並提出解決方案。透過對現實情況的認識和適當的期望，可以更好地因應挑戰，並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推動社會朝向更加包容與和平的方向發展。

本書集結了八篇論文，由C. Ramírez-Barat與M. Schulze共同編輯。Ramírez-Barat博士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研究中心（*Auschwitz Institute*）沃倫教育政策計畫（*Warren Educational Policies Program*）的主任，在此之前，她曾擔任ICTJ高級研究員。她的研究專注於轉型正義，特別聚焦外展（*outreach*）、媒體和文化。最近，她專注於轉型正義與教育交叉領域，包括研發肯亞真相委員會兒童友善版本。她是多本書籍的主編和合編者，並撰寫許多關於轉型正義和人權的報告與論文。Schulze現任漢堡應用科學大學國際辦公室主任。她曾擔任Georg Eckert教育永續和平專案學術專案協調員、GEI國際事務協調員。在加入GEI之前，她在漢堡美國總領事館擔任文化事務專家超過15年，並在漢堡美國之家擔任教育顧問。Schulze在教育和國際事務領域擁有豐富的專業背景和經驗。

## 貳、各章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設計和實施轉型正義教育媒體和材料」，探討教育媒體和材料在轉型正義計畫方案中的角色、使用和設計。四位作者分析了哥倫比亞（Republic of Columbia）、獅子山共和國（Republic of Sierra Leone）、盧安達共和國（Republic of Rwanda）、摩洛哥王國（Kingdom of Morocco）和加拿大的轉型正義教育方案。第一章〈製作課堂教材：開啟關於哥倫比亞武裝衝突辯論的努力〉由M. A. Rocha撰寫，文中首先介紹哥倫比亞國家歷史記憶中心（Centro Nacional de Memoria Histórica, CNMH）的工作，該中心鼓勵哥倫比亞的教師在課堂上討論衝突議題。接著，Rocha將哥倫比亞的努力與智利、瓜地馬拉和西班牙的類似經驗互相連結，並指出了一些阻礙，包括教科書的品質、教師的政治化態度和學生的冷漠。Rocha以CNMH研發的「教師工具箱」為例，說明教師的研究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如何發展，及其在課堂上討論哥倫比亞武裝衝突歷史記憶時，如何創造歷史內容與學生生活的連結及培養學生的社會—歷史能動感（sense of socio-historical agency）和同理心。為了激發課堂中的批判性思維，教科書透過引導學生根據不同資料來源得出自己的結論，以促進批判性思維，這些資料來源包括政治家的演講、新聞、證詞、圖表和法律摘錄等。藉由這種方式，學生被鼓勵參與系統性的探究。同時，「教師工具箱」的教材也試圖透過具有象徵意義的案例，揭示多年來被隱藏的事實，並以受害者的聲音為核心，激發學生的同理心，使他們能夠感同身受同胞所遭受的苦難。CNMH的工作說明了轉型正義框架的應用，透過明確但謹慎地解決社會最近的創傷和人權侵犯，為未來的穩定和強大的民主文化奠定基礎。

在第二章〈超越轉型正義：評鑑盧安達共和國和獅子山共和國戰後學校的外展和教材〉中，D. Bentrovato探討了獅子山共和國和盧安達共和國轉型正義教育推廣工作之成效。作者分析盧安達共和國和獅子山共和國為教育年輕世代理解國家的暴力歷史所研發的推廣學習資源——獅子山共和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終報告的高中版本及聯合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所製作的《千山之國的百日》（*100 Days in the*

*Land of the Thousand Hills*)。這兩項學習資源都屬於圖像小說或漫畫的類型。Bentrovato的研究發現，透過創新的漫畫或圖像小說格式可促進年輕人對敏感議題的認知和情感參與。然而，該研究也揭示了此類教材在促進年輕人理解過去暴力、其特殊性和複雜性上的限制，包括遺漏和簡化、缺乏歷史背景的解釋及對受害者觀點的探討不足，此外，對戰爭的陰暗漫畫或卡通描繪則可能會分散對衝突原因的學習。田野調查結果則顯示，由於普遍存在沉默文化和霸權性官方記憶，教師在使用這些材料時表現出謹慎和抵制。再者，這些學習資源雖是線上可近的，但很少年輕人知道這些資源，顯示轉型正義推廣工作與學校系統的連繫有待加強。儘管存在上述挑戰，Bentrovato建議在教師得到適當準備的情況下，利用這些材料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歷史思維，並鼓勵學生反思暴力歷史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議題。

第三章〈轉型正義背景下的教育改革：摩洛哥記憶研究與人權教育的對比〉，作者N. Belkziz研究了2004年摩洛哥公平與和解委員會（Instance Equité et Réconciliation, IER）的結果和建議。摩洛哥政府透過各種紀念措施來防止暴力再次發生，包括公開IER最終報告、電影、紀念石和攝影集，但這些措施對民眾對過去的看法影響有限。Belkziz接著探討摩洛哥在轉型正義背景下的教育改革，特別是記憶研究與人權教育之間的對比。作者分析透過新設立的歷史碩士課程以及開放和利用真相委員會檔案進行記憶研究的機會如何被錯過——由於學生無法自由選擇研究主題，加上無法獲取IER的檔案與缺乏資金，記憶研究計畫遭受阻礙，以失敗告終。摩洛哥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將資金轉向人權教育，支援人權俱樂部等倡議，並試圖將人權內容納入教科書中。然而，教師在討論過去時仍面臨自我審查和焦慮的挑戰。此外，許多學校在維持學生和教師興趣方面仍面臨困難。Belkziz的分析顯示，如果希望教育能充分解決摩洛哥的轉型社會性質，人權教育必須與有效的記憶研究結合。摩洛哥在轉型過程中未能充分處理過去，因此在教育和紀念領域的努力導致了官方敘述的建立，推動一種以和解、社會凝聚和與過去決裂為基礎的前瞻性正義取徑（forward-looking, justice-based approach）。

在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和解教育：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後的轉型正義〉中，S. Fratila探討了將轉型正義方法應用在像加拿大這樣仍受殖民衝突困

擾的國家所面臨的挑戰。Fratila分析了加拿大於2015年完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工作成果，批評TRC將殖民主義視為歷史而非當下經驗，以及它雖強調療癒（healing）原民和原民社區的重要性，卻沒有檢視當前移民和原民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加拿大的和解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不願承認原民的土地權利，以及殖民和資本主義結構的持續存在，這些因素阻礙了將加拿大描繪為轉型社會的任何詮釋。Fratila認為，教育系統的去殖民化和教育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 of education）是解決加拿大幾代人持續存在的不正義的重要步驟。教育系統可以透過辨識其結構如何邊緣化原民以及種族主義如何根植於教室中來進行去殖民化，然後透過改變其運作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除了本土化正規教育和保留原民知識、文化外，將原民和非原民學生與教育工作者聚集在傳統教室內外，對於消除殖民主義亦不可或缺。最後，作者提醒去殖民化教育實踐的責任落在生活在原民土地上的每一個人身上，並指出年輕人、教育工作者和原民領導（indigenous leadership）在塑造轉型正義機制中的重要性——年輕人代表未來，他們的參與可以確保轉型正義的永續性。教育工作者在傳播歷史真相和推動文化理解方面扮演關鍵角色，而原民領導則能提供寶貴的觀點和指引，確保轉型正義的實施符合原民社區的需求和價值觀。

第二部分涵蓋了「教育在轉型正義背景下的情境：行動者和實踐」。這部分以D. Haumschild對盧安達Murambi種族滅絕紀念中心（Murambi Genocide Memorial Center）的分析揭開序幕。作者以該紀念中心為案例，探討戰後社會中教育機構的紀念和公共記憶功能所面臨的問題。Haumschild分析盧安達政府如何透過Murambi紀念中心的紀念活動來加強其權威。該紀念中心展示了大屠殺現場的屍體，以製造恐懼和痛苦，遊客被引導體驗生存者的邏輯，而非促進對話和反思，並藉此合法化政治權威。作者認為，死亡和悲劇應該被抽象地思考，而不是直接體驗。這種「難以忍受的寫實主義方法」阻礙了民眾以批判性或理性方式回應，干擾了紀念活動所要傳達的「不再重蹈覆轍」（never again）的資訊。文中指出，暴露暴力歷史及民眾無法對屍體的證詞發表意見，強化了政府對過去和現在敘述的控制，使得安排此類展示方式的執政當局更加受到尊重，紀念中心因而成為盧安達政府強化其權威的工具。這反映出不當的意涵，因為控制公民面對死亡的脆弱性，實際上遵循了和種族滅絕相同的邏輯——這種對威脅和生存的

強調實際上與和解、社會轉型和建立和平的目標互相矛盾。

第六章〈實務洞察：大屠殺教育對轉型正義課堂的啟示〉由S. Clarke-Habibi撰寫，探討了轉型正義教育與其他教育方法之間的關係，尋找設計和實施的見解，並檢視大屠殺教育的先例。作者首先強調過去20年轉型正義、外展和教育之間關係的變化。接著比較和平教育、人權教育和衝突敏感教育（Conflict-Sensitive Education, CSE）教學法的優點和限制：和平教育強調培育和平文化，但常忽略暴力歷史的深入省察；人權教育著重於提升人權意識，但缺乏對地區性暴力歷史的探討；衝突敏感教育雖提供了分析框架，有助於反思和避免衝突，但缺乏處理過去或促進和解的具體指引。簡言之，這些教育方法是因應暴力衝突和促進社會和解的重要工具，但在實踐中仍需更全面的考量和補充。作者進一步分析大屠殺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和轉型正義教育之間的相似點，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課程設計須經過深思熟慮的平衡，如內容、教學法和學生參與；強調促進批判性思考、道德反思和對複雜歷史事件的細緻理解是教學關鍵；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意避免對記憶的負面濫用，並促進共同人性（shared humanity）、道德包容性和普世責任感的敘述；同時，教育界應該認知可能面臨的阻力和挑戰，並提供支持和引導，以實現轉型正義教育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教授有關暴力歷史的過程應該避免削弱學生的希望感和能動性，並鼓勵學生以積極方式參與社會療癒、社區重建與和平建設。最後，課程和教學法應隨時間和學生態度的變化而不斷演變，教師應該保持對政治氛圍和教室人口結構的敏感，以便處理不同觀點和敏感性，並引導學生因應有爭議的交流。

J. Brankovic在〈人權時代的人民力量：受害者對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教育的貢獻〉一章中比較了Khulumani支持團體和正式教育機構在後種族隔離時期納入人權教育的教育活動。Brankovic指出，南非政府在種族隔離結束後引入人權教育，卻面臨轉型後歷史和結構性不公正仍持續存在，以及新民主時期提出的競爭文化和經濟生產力的新自由主義文化發生衝突等挑戰，反映出轉型正義中政治和經濟自由化之間的張力。由於轉型時期實施的人權教育未能充分考慮南非的社會經濟現實，遂削弱了邁向社會變革的努力。相對於政府推動的人權教育，Khulumani的教育活動展現了人權教育的轉化性願景，強調批判性思維、基層解決方案和代際交流。透過賦予成員和青年應對社會挑戰的能力，Khulumani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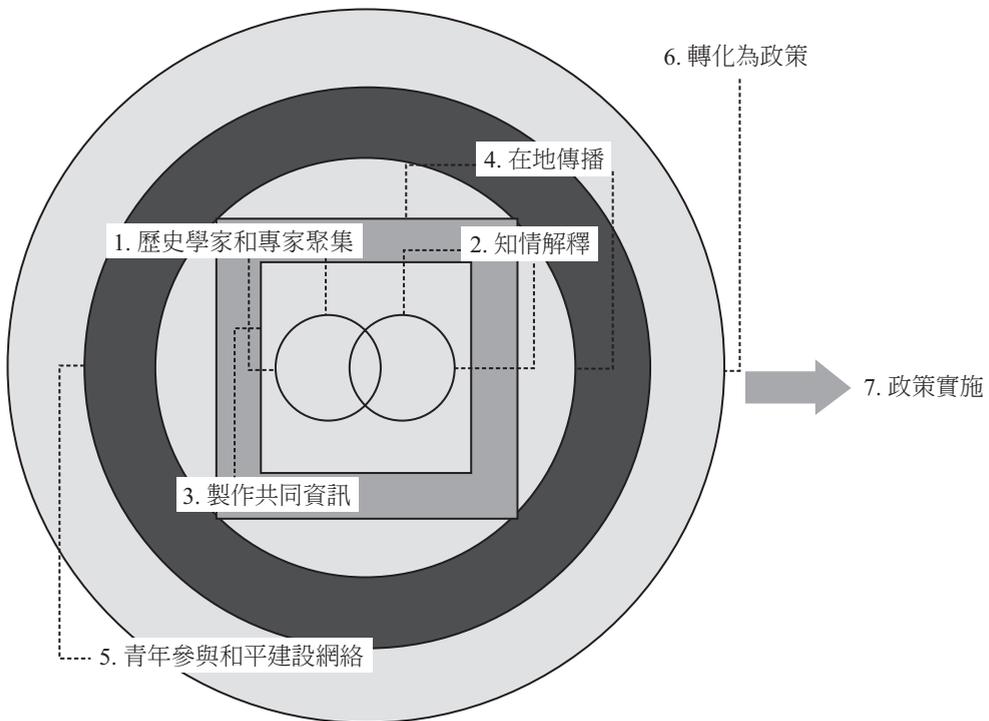
人民教育（people's education）的傳統，主張社會經濟轉型和積極公民參與。作者認為，Khulumani等民間受害者團體的策略更能回應轉型社會的教育需求。此外，由於受害者團體有能力以一種挑戰轉型前歷史敘事並強調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之方式來建構和呈現受害者故事，這種方法挑戰以國家為中心的人權教育，因此像Khulumani這樣的受害者團體可以透過關注過去的結構性不公正及其在當下的遺留問題，填補國家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的空白。最後，Brankovic在文末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受害者團體應該與政府合作進行正式教育改革，還是進行獨立的教育活動，並呼籲進一步研究受害者團體在教育中的角色以及轉型正義與教育之間的關係。

N. Siddiqui所撰的〈在教育和平的前線：課堂上藝術為本的故事敘說〉探討教授轉型正義的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有時帶有創傷性的經歷。她特別關注表演藝術和故事敘說（storytelling）對教育工作者工作和個人成長的潛力。Siddiqui研究了黎巴嫩（Republic of Lebanon）、阿富汗（Afghanistan）和伊拉克（Republic of Iraq）的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環境，發現參與式劇場和故事敘說方法有助於創造討論空間，使當地人能夠主導記憶的重建，並納入宗教、倫理、文化、社會和社會心理面向的考量。作者強調，教育工作者在涉及敏感主題時，需先確保有安全和創新的空間，讓他們能夠自由討論個人和專業經驗。她指出，僅僅注重課程和教學方法，而忽略教育工作者本身的情感和心理狀態，將阻礙任何教育改革的實現。因為教育工作者是傳授新課程或教學方法給學生的橋梁，他們自身的經驗和因應能力對於有效地傳遞歷史、促進轉型正義與和平建設占有關鍵地位。參與式劇場和故事敘說方法能夠幫助教育工作者重新審視過去、克服創傷，並促進社會後代的情感和思想發展。因此，作者建議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創意空間，讓教育工作者能夠聚在一起，建立關係，並探討個人和專業的經驗。這樣的空間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理解 and 因應挑戰，提高對教學方法的信心。

最後，T. Schelfhout和R. Bücking合撰的〈在研究與教育之間搭橋：歷史正義與和解研究中心〉分析了歷史正義與和解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HJR）所進行的工作，特別關注彌合研究和教育實踐之間差距的活動。作者們強調該研究中心創新的共享敘事（shared narrative）方法作為轉型正義教育工具，目的在透過歷史研究和教育重塑學者、教育工作者和分裂社

會中的青年人之觀點。Schelfhout和Bücking檢視了IHJR從研究機構轉型為一個將教育成果納入其中的機構所涉及的努力、挑戰及其促進社會間和社會內和解的使命。IHJR在整合具有對立議程的學者、促進共享敘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資源限制、人際動態，以及傳播和社會影響方面的挑戰，凸顯出處理敏感歷史議題和推動和解過程中所面臨的複雜性和困難。值得注意的是，兩位作者詳細解釋了IHJR改變理論的七個步驟（如圖1），以及理論上的張力如何在實踐中體現。茲簡述七個步驟如下：

圖1  
IHJR的變革理論



註：取自“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by T. Schelfhout & R. Bücking, 2018, In C. Ramírez-Barat & M. Schulze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Engaging Young People in Peacebuilding and Reconciliation* (p. 232), V&R Unipress. <https://doi.org/10.14220/9783737008372.229>

一、歷史學家和專家聚集：來自對立社群的歷史學家和專家受邀聚集在一起，討論建立共同歷史敘事。

二、知情解釋的框架：來自對立社群的歷史學家和專家就創建一個對衝突進行知情解釋的計畫框架達成一致。

三、製作共同歷史敘事的資訊：歷史學家和專家製作展示衝突各方共同歷史敘事的資訊，以供教育工作者、大學教授和青年人使用。

四、在地傳播：在地行為者、大學教授、教育工作者和媒體在國家層面傳播有關共同敘事的資訊，以促進青年人對他人觀點的認識。

五、青年參與和平建設網絡：年輕人參與和平建設網絡，利用IHJR的工作對抗和防止地方、區域與國家當局對有爭議的歷史遺產之誤用。

六、轉化為政策：地方、區域和國家政府將IHJR的工作成果轉化為支持和解的政策。

七、實施和解政策：當地、區域和國家政府實施支持和解的政策，促進對立社群之間的和解。

此外，文章強調了學者與來自對立社區的年輕人之間對話的重要性，結合個人歷史與研究見解，可能是在後衝突社會中實現共鳴、理解和穩定的有效途徑。

整體而言，本書探討了全球各種背景的轉型正義教育計畫，從不同角度和面向探討教育如何有助於推動轉型正義的進程。各章作者們專注於實踐層面，闡述在後衝突社會中連結轉型正義與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同時提供了在轉型正義環境中教材研發、活動設計和計畫推動的見解與建議。討論的範疇涵蓋了辨別政治、社會和實際挑戰，並提出了克服這些挑戰的多種策略，以及教育系統中融入轉型正義內容和策略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本書深入剖析了轉型正義教育的核心特質和難題，探討教育如何有效地幫助建立更具備能力和更具韌性的社會，為實踐者和決策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和啟示，以實現「不再重蹈覆轍」的目標。

## 參、啟示與反思

轉型正義與民主轉型息息相關。這項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社會重建工程，已成為許多國家邁向民主轉型的關鍵。自1990年代起，臺灣政府和民間推動

了各項轉型正義工程，為民主進程貢獻良多。隨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22年完成任務總結報告，臺灣的民主之路亦邁向新的里程碑。然而，葉浩（2018）認為臺灣文化欠缺轉型正義中重要的「和解」元素，加上對民主政治的「妥協」精神有所誤解，造成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步履維艱。此外，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真相」與「和解」不容易同時並進，這其中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來使兩個目標可以並行無礙，而非漸行漸遠。畢竟，有些時候揭露真相未必能促成和解（花亦芬，2016）。在臺灣，歷史遺留、集體記憶和公民意識的問題格外複雜，尤其是威權遺留與國家認同的雙重轉型正義課題（甄曉蘭，2022），涉及整個社會文化體質的積極改造及社會價值觀的重新建立，無法僅依賴司法或政治手段解決。因此需要連結教育，將轉型正義議題融入教育實務，讓年輕一代參與轉型正義的實踐，透過面對過去來轉化未來，方能落實轉型正義的目標。

本書的貢獻在於跨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案例，呈現教育在轉型正義及和解過程中的多重作用和挑戰。從教材設計、教學活動到教師培訓，再到教育制度的改革，都是推動和解與社會轉型的關鍵因素。然而，書中也指出了教育在處理敏感議題和史實時所面臨的困難，以及記憶政治的複雜性。這些為實現更加包容和公正的教育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以下結合本書內容與本土脈絡，提出啟示與反思。

## 一、轉型正義教材設計與教學的原則

轉型正義教材設計與課程教學面臨著多重挑戰。其中一個主要挑戰是教材內容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在處理敏感和暴力歷史事件時，教材必須提供準確的資訊，並呈現事件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然而，許多教材可能會遺漏重要細節，或者以過於簡化的方式呈現歷史，這可能會導致學生對過去的理解不夠全面。此外，教材的有效性和吸引力也是一個挑戰，過於嚴肅或沉重的教材可能會使學生失去興趣，導致教學效果不佳。最後，教材可能忽略或不充分探討加害者的觀點，這可能會導致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理解不夠全面，以及對於和解與轉型正義的理解不夠深入。

在面對轉型正義教材設計與課程教學的挑戰時，有幾項原則至為關鍵。首先，準確性和完整性是教材設計的基本原則之一。教材必須提供準確和完整的歷

史資訊，並呈現事件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圖像小說或漫畫形式雖可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激發他們的情感參與，教材設計和課程教學更應該聚焦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提供多種資料來源，幫助學生分析和評估不同觀點，並形成獨立的看法。最後，教材和課程應該是包容和多元的，尊重不同的觀點和經驗。這有助於學生建立尊重和理解的價值觀，並促進社會的和解與共融。透過遵循這些原則，教育可望成為轉型正義的有效工具，幫助社會處理過去的創傷並走向和解與和平。

## 二、培養教育工作者轉型正義教學技能與情意

儘管教師們對批判性思維的概念表示讚賞，但他們很難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教學法。前聯合國秘書長K. A. Annan (2010) 指出：

即使是在要求其教師教授大屠殺的國家中，很少有國家就如何教授大屠殺向他們提供任何具體培訓或指導。每個國家都鮮少有教師具備教授大屠殺的知識或技能，使現今的青少年能夠將其與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緊張局勢與自己的生活連繫起來。

本書第一章詳細討論了哥倫比亞國家歷史記憶中心「教師工具箱」的設計過程，來自該國不同地區的教師在過程中提供了建議和積極參與，這種合作對課程設計非常關鍵，因為教師最瞭解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在啟動課堂討論武裝衝突時面臨的挑戰。作者指出，「教師工具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供方法論材料，教導教師進行深入研究並得出自己的結論，最終學會質疑自己對武裝衝突的先入為主觀念。因此，目的不僅是向教師介紹哥倫比亞不同地區發生的創傷事件；它是為教師和學生制定一個指引，以發展批判性思維和檢驗自己的想法與信念的習慣 (p. 58)。此類教材發展與教師增能模式，值得相關單位參考。

另外，除了強調教師在轉型正義教育的知識和技能，教師的心理狀態亦不容忽視。本書第八章特別關注到教育工作者的社會心理層面。作者指出，在沒有政治意願或資源的情況下，幫助教育工作者透過各種教學技巧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探究，可能比改革課程更緊迫或更有影響力。然而，在教育工作者自己經歷暴力或

壓迫的情況下，加上社會因素和家庭動態對學生的想法和行為之影響，這一點往往很難達成，並且對教育工作者的福祉產生負面影響（p. 217）。文中強調教育工作者在教授與衝突和壓迫相關的敏感議題時所面臨的挑戰，因此，創造一個安全和支持性的工作環境，讓教育工作者能夠建立關係，共享個人和專業經驗，對於處理困難主題和提升教學效果至關重要。這不僅有助於教師在教學上更具自信和效能，也能促進教師對學生的積極影響力和轉型正義教育的實踐。

### 三、推動原民領導與民間組織參與的轉型正義策略

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面臨著蜿蜒曲折的挑戰，其中部分原因是無法處理來自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然而，在轉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中，可以從本書其他國家的經驗中找到一些啟示。例如，第四章反省加拿大原民的轉型正義議題，提出了教育改革方向。作者認為，如果教育被濫用以實施對原民的種族滅絕，則有必要透過原民領導來教育非原民和原民學生（p. 133）。其強調透過原民領導來改變教育體系中存在的種族歧視和不公正，以促進跨文化理解和共融。同時，第七章介紹的南非Khulumani受害者團體採用的人民教育提供了另一個值得參考的範例，透過組織青年對話、提供公民新聞培訓等方式，解決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的社會經濟排斥問題（p. 200），填補了轉型正義過程中的空白。

最後，協助年輕人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公正和共融的社會是所有人的責任。這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和投入。同時，教育體系的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環，教育工作者必須敏覺於轉型正義教育的挑戰與機會——既可能引發衝突，也可以幫助理解過去的衝突，促進和解、建立和平，以及防止暴力再次發生。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仍然漫長，期待社會各界攜手努力，為下個世代打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DOI: 10.6910/BER.202403\_70(1).0005

## 參考文獻

花亦芬（2016）。面向歷史複雜性的轉型正義：中東歐經驗給臺灣的啟示。《國史研究通訊》，11，23-34。

- [Hua, Y.-F. (2016).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face of historical complexity: Insights from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 for Taiwan. *Academia Historica Research Newsletter*, 11, 23-34.]
- 葉浩 (2018, 10月16日)。轉型正義的艱難——重新理解「和解」與「妥協」的意義。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ransitional-justice-yeh-hao>
- [Yeh, H. (2018, October 16). *The difficult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Reconceptualizing the meaning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mpromise”*. The Reporter.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ransitional-justice-yeh-hao>]
- 甄曉蘭 (2022)。轉型正義與教育連結的意義與可行路徑。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4 (1)，62-67。
- [Chen, H.-L. S. (2022). Meaning and feasible approaches of link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with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24(1), 62-67.]
- Annan, K. (2010, June 17). The myth of “never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0/06/18/opinion/18iht-edannan.html>
- Bamírez-Barat, C., & Schulze, M. (Eds.). (2018).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Engaging young people in peacebuilding and reconciliation*. V&R Unipress.
- Schelfhout, T., & Bücking, R. (2018).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C. Ramírez-Barat & M. Schulze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Engaging young people in peacebuilding and reconciliation* (pp. 229-248). V&R Unipress. <https://doi.org/10.14220/9783737008372.229>

